

三線廠與農村的互動關係

——以上海小三線建設為中心

• 陳 熙

摘要：1960年代中期開始，三線建設運動大規模地將城市地區的工業遷入中國內地山區和農村，形成了計劃經濟時期一次特殊的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間的交流和碰撞。本文以上海小三線建設為研究對象，從移民和城鄉關係的視角出發，系統梳理了三線廠與農村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認為，三線廠不僅以企業捐贈的方式給予遷入地大量援助，而且也形成了文化擴散、經濟變動、環境污染等溢出效應。由於工業文明相對農業文明的天然優勢，三線廠長時間主導着這場土客互動的進程和走向。然而，雙方的互動關係並非單向的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輸出—接受」模式，農村的「主場」優勢同樣不可忽略。當地的農村和農民曾給予三線廠主動的反饋，其中既有提供土地、勞動力和安定的環境等正面支持，也包括各種謀取私利、機會主義的負面行為。因此，雙方的互動關係是多向性且隨時間變化的。

關鍵詞：小三線建設 三線廠 安徽屯溪 城鄉關係 上海

上世紀60年代，中國面臨的國際外交形勢緊張，中共中央認為美蘇有可能大規模入侵，而中國的重工業、大城市和物質儲備等高度集中於東部和東北等沿海沿邊地區，一旦戰爭爆發，工業體系和國防體系可能面臨毀滅性打擊。為了有效應對戰爭威脅，平衡地區間工業布局，毛澤東根據戰略位置將全國劃分為三道防線，東部沿海及北部邊疆等外敵入侵要衝地帶稱為「一線」，

* 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小三線建設中的人口遷移與城鄉關係研究」(2016ELS00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小三線』建設資料的整理與研究」(13&ZD097)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三線建設工業遺產保護與創新利用的路徑研究」(17&ZDA207)的成果。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文責自負。

中部省份緩衝地帶稱為「二線」，西南、西北等戰略腹地稱為「三線」，並要求將一線的工業大量遷入三線，工業投資重點轉向三線地區，將三線地區建設成穩固的後方基地^①。三線建設又分為「大三線」和「小三線」，1965年，毛澤東根據廣東省在本省建設小三線的報告，要求東部一、二線省份仿照全國三線的劃分方式，在省內劃分一、二、三線，開展省內的後方常規武器基地建設，以便在戰爭爆發之際各省可以獨立作戰。與內地「大三線」相對應，一、二線省內的後方建設被稱為「小三線」^②。

在三線建設過程中，大批城市工業、工廠和工人在短時間內按行政命令遷入內地山區和農村，使得工人和農民、工廠和農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對接和碰撞，其中既有積極的交流互動，也不可避免地產生衝突和紛爭。三線廠既為遷入地農村帶來先進工業文明，也造成了物價上漲、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同時，農村為三線廠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土地、勞動力以及安定的環境等必要的支持，但後來也出現了種種機會主義行為，使得雙方關係日趨緊張。因此，儘管三線廠是裹挾着最高領袖的指令而來，但是工人和農民、工廠和農村之間的互動關係仍是複雜的，並隨着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改變而悄然變化。

早期的三線建設研究主要是在公開發行的資料彙編、地方志、回憶錄等基礎上，從宏觀層面探討三線建設的起因、經過、成就、問題、調整改造以及經驗教訓等方面^③，但由於資料所限，大都是輪廓式和過程上的描述，多着眼於政策變化，對專門問題的討論不夠深入。近年來，隨着基層檔案資料的大量挖掘以及對特定專題的深入探討，三線建設尤其是針對小三線建設的研究開始步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主要特徵是大量使用新發掘的原始檔案資料和口述資料，問題意識更加鮮明，從而形成了一批較為扎實的研究成果^④。然而，目前對於三線廠與當地農村、農民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研究仍有待深入，這些研究多傾向於肯定三線建設在經濟上給內地帶來的積極效果，因而在論及三線建設與農村之間的關係時，往往認為三線廠向農村輸出工業文明的「輸出一接受」單向模式是雙方關係的主流。

從移民及城鄉關係的視角來看，三線建設致使城市工業文明和城市人口遷入農村地區，形成了計劃經濟時期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之間的一次正面交流和碰撞，構成了中國二十世紀後半期城鄉關係史和移民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對當地農村和農民的經濟、生活、觀念、環境等造成深刻的影響，也對三線移民自身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對三線移民及其與當地農民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可以成為理解這一時期中國移民史和城鄉關係史的一個典型案例。

本文主要以1965至1988年間上海小三線建設為研究對象。上海小三線（也稱上海後方基地）坐落於以安徽屯溪為中心的皖南山區，東起浙江天目山，西至安徽東至，南抵浙江開化，北達安徽寧國、貴池，東西跨越250公里、南北長達200公里，其目標是建設「一個以生產高射武器和反坦克武器為主的綜合性基地」^⑤。自1965年起，從上海市拆分遷建大批工廠企業到皖南，陸續建成機械、冶金、儀器儀表、化工等工廠，以及醫院、學校、車隊等配

套單位，共計八十一家，鼎盛時期擁有在冊職工5.4萬人、家屬1.7萬人，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小三線建設基地^⑥。本文在充分挖掘檔案資料（包括省級、縣級、廠級的相關檔案），並在對親歷上海小三線建設的工人、官員、村民等進行口述訪談的基礎上，對建設過程中的土客互動問題進行分析，力圖還原和展示這一時期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之間互動的多元性。

一 三線廠對農村的援助

在支援地方和農村發展的名義下，三線廠對所在地農村進行了大量的援助，既包括工業材料、農業器械、基礎設施等物質層面的援助，也包括技術支援、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方面。這種援助實際上構成了三線廠對所在地的企業捐贈行為，只是與市場經濟下的企業捐贈不同，三線廠的捐贈是上級政府有組織的安排。這種捐贈行為不單單是出於道德情懷，具有補償意味，實際上也是為了換取地方政府、公社以及農民對三線廠的支持和配合，以降低三線廠運作的社會風險，帶有互惠互利性質。三線廠對所在農村的捐贈規模大、時間長、內容廣，讓當地農民頗為受益，構成了三線廠與當地農村互動的重要內容。

（一）支援農村的政策原則

中央政府在三線建設戰略推行之初，即對如何處理三線廠與當地農村之間的關係問題給予了很大的重視。「正確處理工農關係」被確定為三線建設的基本方針之一^⑦。1965年9月，國家計劃委員會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綱要中提出，在加快三線工業建設的同時，要注意發展農業生產，並「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⑧。作為一項中央政策，支援農業生產被貫徹於各省市的三線建設中。上海市要求各三線廠（下文如無特別說明，三線廠指上海皖南後方基地各小三線廠）和單位，要盡可能同當地公社、生產大隊結合，並把「廠社結合、工農結合問題，放在建廠的首要位置」^⑨。對當地農業的支援並不是三線建設初期的權宜之計，而是貫穿於整個三線建設戰略的始終。1974年初，上海市委馬天水要求三線廠「要支持周圍的農業生產，把農業搞上去」，並反覆強調「同當地關係一定要搞好」^⑩。上海後方基地黨委要求各三線廠「積極主動地支援農業、支援地方」^⑪。除了對農村的直接支援外，中央還要求各地在開展三線建設時，盡可能降低對當地農村的負面影響和對農民利益的損害，要求做到「不佔高產田，少佔可耕地，不遷居民，便利居民」^⑫，而當確實需要佔用耕地時，也應「採取開荒還田或使得社、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等補救措施」^⑬。此外，上海市委還要求各三線廠利用農閒與業餘時間，舉辦一些文化、技術綜合訓練活動，吸收貧下中農參加，以改善與當地農民之間的關係^⑭。總體而言，支援農村、改善工農關係，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推行和落實三線建設過程中的一項基本原則。

(二) 直接的物質、資金與技術支援

在支援農業的大方針下，三線廠不斷為當地農村提供物質援助。上海小三線在皖南農村的二十餘年間，在農業基礎設施、農機設備、建材、資金、救災等諸多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援助當地農村。三線廠給予農村的物資主要有水泥、鋼材、拖拉機、汽車、化肥、機電設備和其他工業品等。鑒於中央在「三五」計劃中提出三線地區的「化肥生產先走一步，以促進當地農業生產」的要求^⑤，上海小三線曾先後為安徽歙縣、宣城、休寧、績溪、貴池、東至、寧國等地修建了小化肥廠^⑥。據不完全統計，僅1977年上海三線廠就為皖南農村提供了小化肥廠設備6套，此外還有大拖拉機、手扶拖拉機300餘台，汽車53輛，水泥2,000多噸，鋼材376噸，以及大量的農機配件和物資^⑦。不少三線廠在途經水稻田的自來水管上安裝專用閘門，以便在亢旱時節為沿線的農田提供灌溉水源^⑧。對於農村提出的生產物資上的要求，如灌溉用的電動機等，工廠也盡可能提供^⑨。

救災是三線廠對農村援助的一部分。1983年入梅以後，長江中下游普降大雨，貴池全縣70%耕地受災，八五、勝利、前進、五洲、永紅、火炬、三二五等七個上海三線廠（位於貴池）從企業基金中籌款11萬元支援地方；上海市政府也撥救災款10萬元，支援貴池災後重建^⑩。次年8月，皖南再遭水災，房屋損毀嚴重，三六六電廠（位於寧國）借了二十間房給附近的青龍公社作為過渡房，為期半年^⑪。據統計，勝利機械廠在建廠後十八年間援助附近的公社、大隊、小隊，各類資金累計多達114萬元^⑫。三線廠直接援助農村的資金主要用於基建和救災。

除了上述大規模的物質和資金援助外，三線廠還在人力、技術方面為當地農民及社隊提供必要的幫助。協同機械廠（位於寧國）的一份修理清單顯示，該廠頻繁地為當地社隊提供各類農機設備的修理服務，包括拖拉機、打稻機、汽車、磨粉機、碾米機、水輪泵、噴霧機等機械設備的修理，為社隊提供所需的皮帶盤、軸承蓋、軋油滾筒、油柱、聯軸器、水管等各類機械配件，以及保養、焊接、鍛打、磨口等技術服務^⑬。這種日常化的機器維修服務對當地農業生產所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

此外，三線廠一項例行的支農活動是每年夏季組織幹部和工人幫助農民搶收搶種，俗稱「雙搶」。協助農民「雙搶」是三線建設之初的既定政策。在1966年搬遷之初，上海市便要求各三線廠「在農忙季節組織職工說明生產隊搶收搶種」^⑭。在「雙搶」中，各三線廠成立了突擊隊、機修隊、運輸隊、醫療隊等，為公社接通電源、水源，運送農忙物資，修理脫粒機、拖拉機等農業機械。據不完全統計，僅1972年上海小三線便支援農村勞力近萬人次，幫助收種面積達1,200餘畝，修理各種農具和農業機械1,800多台（次），協助當地運輸7萬多噸物資^⑮。由於每年農忙時節三線廠都會組織聲勢浩大的支農「雙搶」活動，因而給當地農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口述訪談過程中，多位受訪的當地農民曾提及此事。不過，這項例行的支農活動的象徵性意義大於實質，只是三線廠向農民表達善意之舉。農民明白城裏來的工人並不擅長插秧割稻，

也不指望工人能幹多少農活，但仍對此表示感激和歡迎，認為是三線廠對農民的一份「好心」和「心意」^⑳。

(三) 建設基礎設施、開放醫療和社會福利

除了直接的援助外，三線廠在建設配套的基礎設施時，也在一定範圍內兼顧周邊農村的需要，從而為當地農民帶來一定的便利。對此，當地農民感受最直接、印象最深刻的是「三通」——通電、通水和通路。

1970年代以前，皖南山區多數尚未通電，普遍使用煤油燈照明^㉑。三線廠到來以後，即為廠區附近的農民接通了電路。三線廠的電力部門在東至縣境內架設了高壓線路210公里，擔負起了東至縣的東流鎮、堯渡鎮兩個工業片以及八區、三十二鄉鎮的工農業生產及民眾日常生活用電^㉒。東至縣香隅鎮龍崗村整個生產大隊四千餘人，該村在三線廠建廠半年內實現通電^㉓。紅星化工廠（位於東至）建成後，每天為周邊農民供電到晚上9點3刻，時間一到，電燈會閃三下，提醒村民熄燈休息。三線廠在主要的交通幹道上安裝了路燈，「一到傍晚所有路燈都開起來了，整個山村都亮起來」^㉔。至少在工廠周圍，三線廠結束了當地農村靠煤油燈照明的歷史^㉕。

三線廠還為周邊村民提供了清潔的自來水。皖南山區民眾原本喝的是未經過濾消毒的井水或潛溝水，因此血吸蟲病在當地十分普遍。清潔的自來水使得當地村民的血吸蟲病患病率大幅下降^㉖，改善了民眾的健康狀況。

道路交通狀況的改善也是顯而易見的。三線廠多選址在深山，山區原本是泥路，寬僅一兩米且崎嶇不平，大型車輛無法通行。三線廠修建的足以供貨車通行的新馬路，大大改善了當地農村的交通。山區河面上橋樑少，且多是簡陋的木橋，三線廠陸續修建了鋼筋水泥橋，不少至今還在使用^㉗。除了路橋以外，三線廠的車輛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當地農民的日常出行。廠車外出時，會捎帶需要外出的村民，使得村民到集鎮、縣城都變得方便。此外，三線廠也可以為當地社隊在修堤壩、防汛、糧食和木材運輸等方面提供車輛運送服務^㉘。

除了「三通」以外，三線廠還向當地農村開放當時相對先進的醫療系統。上海小三線的醫療體系由長江醫院、瑞金醫院、古田醫院、天山醫院以及各個工廠的醫務室構成。四大醫院整體醫療水平不僅高於當地縣級醫院，也高於地區級醫院^㉙；各個工廠的醫務室則為村民提供及時的治療服務。東至縣龍江水廠附近的受訪村民張要華表示，三線廠的醫院救治了許多當地農民，他本人年輕時砍柴受傷的手指，也正是靠龍江水廠醫務室的一位老醫生的精妙救治才得以保全^㉚。

此外，三線廠的文化娛樂和社會福利也有限度地向周圍村民開放。每星期一次的電影放映是三線廠職工最主要的娛樂活動。當時農民的文娛活動極為有限，三線廠的電影放映吸引了大批周邊的村民。協作機械廠（位於浙江臨安）第一次放映電影時，臨近的農民聞訊趕幾十里山路來看，露天放映場人山人海，大大出乎廠方的預料^㉛。光明機械廠（位於績溪）播放電影時，離工廠5至10公里範圍的村民都跑去看^㉜。此外，三線廠的開水、冰水、澡堂、廁所等公共設施大都向當地村民開放^㉝，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周邊村民的生活條件。

上述可見，三線廠對當地農村的援助是多方面的，而且為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實質性的幫助。不過，並不能僅僅把這些援理解為一種共產主義精神的發揚，如前所述，我們實際上應視這種援助為三線廠對農村和農民的捐贈，以期獲取農民的支持。實際上，三線建設的順利推行離不開當地農村和農民的配合，儘管三線建設來自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最高指示，但官方仍需審慎地考慮如何獲取農民的支持，以減少在政策落實過程中的麻煩和障礙。三線廠作為外來者，如果沒有當地農民的配合，可能會陷入農村的泥潭。1980年代以後雙方逐漸增多的衝突事件表明，一旦失去農民的支持，三線廠所遭遇到的種種困境竟可嚴重至無法維持其正常的生產（下詳）。官方對其中的利害關係有着清醒的認識。在1980年連續發生兩次與當地農民之間的鬥毆事件後，上海後方基地輕工公司嚴厲要求各廠的領導幹部切實提高對於改善工農關係重要性的認識，並指出：「三線廠和地方、社隊農民在生活、交通、生產上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離開了當地農民的支援，我們的工作就會增加許多困難，處理好同當地的關係，是我們搞好生產、生活的必要條件。」^④由於三線廠建設佔用了農村的土地、水源等，因此三線廠的援助也帶有補償性質。1974年初，上海市委馬天水表示：「我們去了那麼多人，佔了他們的地方，吃他們的糧食，我們對周圍的群眾總要支援。」^⑤有鑒於此，三線廠對農村的物質援助實際上也應視為三線建設的成本之一。

二 本意之外的效益和紛爭

實際上，三線廠給農村帶來的並不單單是直接性援助和公共設施上的開放和共用，而是有着更加廣泛的、在決策者本意之外的影響——當中既有積極正面的，也有消極負面的，這使得代表工業文明的三線廠和代表農業文明的農村之間的互動關係變得複雜而多樣，而決非僅僅是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單向且正面的物質輸出。

（一）工業文明的擴散

隨着三線建設的推進，大批現代工廠的遷入給原本封閉山區的村民帶來了觀念上的巨大衝擊。當三線廠的汽車「轟隆隆」開進山裏時，絕大多數的農民平生第一次見到了汽車^⑥。三線廠用穩固寬闊的公路代替了泥路，用鋼筋水泥橋代替了獨木橋，用電燈代替了煤油燈，用自來水代替了潛溝水，用拖拉機代替了耕牛；村民在三線廠裏能看到電影、電視，在夏天可分享到工廠裏冰箱的冰水，跟着三線廠的工人喝起了啤酒^⑦。三線廠職工所用的日用品都是從上海運過來的，這讓不少村民「有機會見識到從大城市來的東西」^⑧。在那個信息封閉的年代，三線廠的到來讓當地農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到城市現代工業文明。

城市工業文明的影響不單單局限在器物層面上，三線廠帶來的先進的管理方式和工人的工作作風也令人印象深刻。東至縣幹部章炎盛對三線廠職工的印象可概括為「老實、苦幹、精明」這六個字。他曾幾次造訪衛星化工廠（位

於東至)，發現廠裏的工人勤勉而踏實，並且嚴格遵循廠裏各項規章制度，認為：「如果沒有當時的小三線化工廠，就沒有今天東至縣的香隅化工園……小三線把我們這裏人的視野擴展開了，我們學習的東西也多了。」^⑤一名受訪徵地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三線廠給當地帶來的思想觀念上的變化，認為三線廠把現代文明帶到了山區來^⑥。

三線廠職工的生活習慣潛移默化地影響着當地農村。對於上海職工的生活方式，村民在有意無意間加以模仿，包括穿衣打扮、衛生習慣等^⑦。三線廠的女工穿着當時較為時髦的「的確良」襯衫和窄腳褲，當地村民很快開始模仿^⑧。三線廠職工的衛生觀念也逐漸影響周邊農民的衛生習慣。三線廠家屬區和廠區的公共廁所、浴室等設施是對農民開放的，而當地原本並沒有這些設施。在貴池梅街鎮梅街村村長陳克智的記憶中，三線廠職工吃東西比較講究衛生，東西都要洗得乾乾淨淨^⑨。在三線廠的示範效應下，當地村民的衛生環境和衛生習慣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三線廠帶來的現代工業產品、嚴謹的工作作風和先進的管理制度、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等，在潛移默化之中改變着當地農民的觀念和認知。

(二) 收入增加和物價上漲

儘管三線廠的生產模式高度封閉，不僅生產原料由外地輸入，產品也由中央統一調配外地，甚至連工廠職工日常用品大部分也是從原遷出城市調入，並不在生產和銷售上與地方經濟發生聯繫，但大批工廠和職工的到來仍無可避免地對當地農村的經濟產生影響，其中最為顯見的便是農民收入的短期增加和物價上漲。

農民收入的增加首先來自於建廠初期的務工機會。三線廠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集中於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期，廠房、宿舍、道路、碼頭等基建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廠區附近的農民因而大量參與其中。三線廠付給農民的工資標準介乎上海和當地農村之間，高於當地工資水平^⑩。據受訪的紅星化工廠的徵地工回憶，三線廠周邊的生產隊的分紅是1塊3毛錢一天，而其他生產隊則一般只有幾毛錢一天^⑪。三線廠的到來為周邊村民提供了新的收入來源。由於三線建設佔用了農村的耕地，部分失地農民以徵地工的身份進廠務工。徵地工的招收主要集中在1970至1973年間，共計有千餘名徵地工進入三線廠工作^⑫，這也在一定範圍內為農民家庭提供了新的經濟來源。

大批城市職工的到來形成了對農村土產山貨的市場需求。皖南山區盛產小核桃、竹筍、花生等山貨以及田雞、甲魚、黃鱔等野味，但因為地處深山，這些貨品之前大多無法進入銷售市場，在三線廠職工到來後，這些土產山貨便有了市場需求。隨着市場觀念的興起，山區的經濟逐漸活躍起來^⑬。

三線廠的支農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當地的農業生產水平，使得農業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長。三線廠為當地農業提供了大量拖拉機、車輛，以及灌溉、化肥等設備，有助於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得益於八五鋼廠（位於貴池）的支援，該廠所在公社的糧食產量連年超過計劃^⑭。滿江紅材料廠（位於旌德）建廠徵用了所在生產隊的60畝耕地，於是為當地社隊解決了水源和肥源問題

作為補償，進而帶來糧食增產。1972年，該生產隊人均年收入由40元增加到80元^⑤。

受益於上述幾點，加上三線廠在水、電、交通、醫療、娛樂等公共設施的開放和共享，三線廠周邊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為明顯的提高。八五鋼廠所在地的梅街村在當時被稱為「小上海」^⑥，以至於附近的姑娘都樂意嫁到梅街村來^⑦。不過，這種繁榮局面完全依靠外部的支援，當地農村的經濟結構並未改變，因而在1980年代三線廠陸續撤走後，繁榮景象便隨之消散^⑧。

三線廠在經濟上的溢出效應的另一面是推高了當地物價，而物價上漲招來了地方幹部和城鎮居民的抱怨。三線廠職工日常所需的副食品和蔬菜等主要靠當地供給，然而，大量職工的到來造成市場供應緊張，推高了當地的物價水平，尤其是副食品和蔬菜價格^⑨。農副食品價格的上漲對於農民而言是有利的，但對於當地領取固定工資的幹部以及城鎮居民來說，則是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成本。以貴池為例，1974年當地人口約5萬，而三線廠職工和家屬便有1.5萬人，貴池原本計劃的蔬菜種植產量有限，加上淡旺季很不平衡，國家統購供應的蔬菜只佔40%，其餘60%靠自由市場供應。三線廠職工到來後推高了市場需求和價格，使得自由市場價格和國營價格相差一倍^⑩，屯溪的蔬菜價格甚至比上海高出30至50%，所以當地幹部和城鎮居民普遍反映，三線廠到來後，蔬菜和副食品價格上漲，生活費用支出增長了不少^⑪。

(三) 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

三線廠在經濟和物質上給當地農村帶來益處的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環境保護問題在1960、70年代尚未引起國家的重視，以化工、鋼鐵、機械為主的三線廠本身工業「三廢」（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量大，加上生產工藝水平不高，造成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從而引發了與當地的種種矛盾和紛爭。已有研究顯示，上海、江蘇、廣東、江西、河北、山東、四川等全國多地三線廠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環境污染與破壞^⑫。

三線廠以生產常規性槍械和小型火炮為主，廢水的主要來源是在金屬表面處理過程中產生的酸鹼廢水和電鍍過程中產生的含鉻酸和氰化物廢水等。1974年，上海市衛生局組織了一支職業病防治小分隊赴皖南抽查了四十八個廠的職業病和「三廢」問題，發現四十個廠需要排放工業廢水，其中80.8%超標排放，如培新汽車修配廠電鍍銅廢水中的氰化物超過國家排放標準的599倍，躍進機械廠排放的含鉻廢水超標79倍、含氰廢水超標359倍，新安電工廠含鉻廢水超標168倍（以上三間廠均位於歙縣），光輝器材廠（位於績溪）含氰廢水超標199倍，滿江紅廠含鉻廢水超標40至100倍^⑬，大部分工廠的污水未加處理，直接排放到江河，造成嚴重污染^⑭。

上海小三線規模最大的八五鋼廠，其鋼管車間、軋鋼和斷鋼車間都大量使用硫酸清洗鋼材表面的氧化物。建廠以後，硫酸的使用量逐漸增加，到1983年用量已達每年1,000噸，排放廢酸也增加到每年5,000至5,500噸，每升廢酸中含硫酸濃度180至200克、硫酸亞鐵濃度200克^⑮。此外，該廠排放的鍍鉻廢水超過國家標準80倍、含酚污水超標750至1,200倍、冷卻廢水超標

16,250倍，這些廢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白洋河^⑥，導致下游十多公里範圍內的生產隊不得不通過打井來解決飲用水問題^⑦。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980年，該廠才開始着手處理污水問題^⑧。

有害氣體和粉塵的排放也未採取有效緩解措施，對三線廠職工和周圍農民的健康構成日漸嚴重的威脅。1974年，職業病防治小分隊對三線廠483個操作點進行有毒有害氣體和粉塵的採樣分析，發現其中263個點超過國家衛生標準，佔54.4%。在測定的三十六種有毒物質中，苯類佔27.3%，有害粉塵佔22.5%，鉛佔10.1%，酸類佔11.9%，氰化物佔4.5%，汞佔3.5%，炸藥佔2.9%，其他二十多種毒物佔17.3%。上海後方基地直屬廠測定114個點，有80個超標，佔70.3%；機電公司測定103個點，其中55個超標，佔53.4%；儀表電訊公司測定182個點，有96個超標，佔53.1%^⑨。

廢氣和粉塵不僅威脅人體健康，也對附近的植被和生態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八五鋼廠全廠十六台鍋爐完全沒有安裝除塵設施^⑩，「鍋爐房一旦生火，便黑煙滾滾」，像一條「黑龍」撲來，周邊職工和農民想躲也躲不掉，「只好不斷吸進那一股股混濁嗆人的煙味，煤灰吹到眼裏也得聽便」^⑪。其化鐵爐所散發出來的煙霧（主要含硫磺）熏枯了周圍的樹木近四百畝，引起附近生產隊抗議，最終以每畝80元的價格，賠償3萬餘元了事^⑫。另外，該廠燃氣站冷卻塔近處的樹木明顯枯死，面積約一百畝，又賠償了生產隊1萬餘元^⑬。

生態環境的影響還包括日常生產中的許多方面。三線廠職工的生活燃料問題曾一度造成農村植被的嚴重破壞。職工大量使用樹柴作為生活燃料，「破壞了山林建設，有些山頭才幾年功夫就變成稀稀拉拉的禿山」，引起當地農民的不滿^⑭。此外，儘管三線廠修的路燈和廠區的燈點亮了夜晚的山村，帶來繁華景象，但燈光同時也引來大量飛蟲，威脅農作物生長，增加了農民額外的滅蟲開支。部分工廠的廢渣管理不當，堆積在露天場所，缺乏防護，造成晴天揚塵、雨天漫流，而鐵屑、碎玻璃等部分工業垃圾散落田間，不利於農業生產和安全^⑮。

在三線建設的早期，環境問題幾乎是被完全忽略的。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工業生產過程中的環保問題才剛剛開始引起國家的重視。1973年國務院召開首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通過〈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提出要加強環保和處理「三廢」問題之後，人們才逐步開始關注三線廠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遂有了前述上海市衛生局的調查。即便如此，作為負面溢出效應的典型，環境問題在1980年代仍未得到解決，成為激發三線廠與農村之間矛盾的重要導火索。

儘管三線廠與當地農村之間的互動關係不屬於市場交易行為，但三線廠帶來的影響卻具有類似市場交易中的溢出效應特徵。現代工業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與觀念的傳播屬於正向積極的溢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則是典型的負向溢出，而當地農民收入增加以及物價上漲雖非有意為之，卻是三線廠所帶來的客觀結果。實際上，以上所論述的三個方面影響，皆與三線建設的備戰主旨無關，也不在決策者的預料之內。這些本意之外的影響使得三線廠與當地農村、農民之間的互動關係複雜化、多元化，也使得三線建設的效果超出了單純的備戰預設目標。

三 農村的反饋

前文主要從三線廠的角度出發，論述了三線廠如何對農村輸出現代工業文明，以及其對農村產生的多樣性影響。然而，三線廠與農村之間的互動並非是單向的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輸出—接受」模式。在這場大規模的土客互動過程中，農民作為當地人，對工業文明的輸入給予了主動的反饋，這種反饋既有積極友善的支援和幫助，也有消極自利的抗拒與破壞。儘管外來的工業文明在這場文化互動中佔據優勢，但當地的農業文明仍展示了自己強大的「主場」影響力，並且隨着雙方接觸的加深以及政治環境的改變而變化，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三線廠在農村的生存狀態。

(一) 農民對三線建設的支援

有研究認為，四川廣元地區對三線建設的支援主要包括建材、蔬菜、勞動力和商業配套等方面^⑥。這僅僅指出了其中的顯見部分，實際上，當地政府和農村對三線建設的支援遠不止這些。土地是農村為三線建設提供的最重要物質支援，三線廠的興建必然需要徵用當地農村的土地。至少在1960、70年代，三線建設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於戴着「戰備」的帽子，三線廠在選址過程中看中的土地，當地政府基本上是無條件提供的，安徽省政府專門劃出9.27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旱澇保收的良田），供上海小三線徵用^⑦。徽州專區特別派出一位地委書記負責協調三線廠和人民公社的關係，因此在徵地問題上基本沒有遇到農村的阻礙^⑧。當然，彼時農村土地歸人民公社集體所有，也為徵地的順利推行提供了制度保證。

此外，三線廠在徵地時一般都只是象徵性地支付了一部分補償損失費，有些土地甚至是無償提供的^⑨。因為徵地的補償標準極低，所以被徵用的土地可視為農民為三線建設所負擔的成本。三線建設中的徵地補償標準是按照1958年1月頒布的《國家建設徵用土地辦法》中對徵用土地的補償規定進行的，即「對於一般土地，以它最近二年至四年的定產量的總值為標準」^⑩。例如，1967年三六六電廠徵用寧國縣青龍公社土地時，給予的補償標準是：水田按年產每畝700斤，旱地按年產每畝300至350斤的標準，計算兩年的收成，並以當時糧食統購價每百斤9.5元的標準折價補償^⑪。1969年工農兵醫院（即後來的古田醫院）徵用寧國縣胡樂公社旱地6畝，僅按照畝產稻穀每年100斤的標準計算，補償一年的收成，而次年再次徵用該公社水田時，按畝產每年550斤計算，補償兩年的收成^⑫。補償的標準根據被徵用土地的實際產量由雙方協商，但基本上圍繞上述標準小幅波動。儘管1970年代末以後徵地的補償標準有所提高，補償年份由兩年改為三年，水稻田補償標準提高到年產每畝2,200斤，旱地按照水稻田80%標準賠償^⑬，但徵地的補償模式沒有改變，不僅未考慮土地的溢價，也未考慮土地的長期農作產出。可見農民以十分低廉的價格為三線廠提供了土地。

三線廠基建所需的大量勞動力，相當一部分是由當地農民承擔的。地方政府曾大規模組織民兵隊伍參加三線廠的基建工程，農民也大量參與修建公路、平整場地、架設電線、軋鋼筋、開溝護坡、建築房屋、擦洗機器、裝卸搬運、設備安裝等工作^⑥。此外，三線廠在勘探選址和建廠之初，要在深山荒野中從無到有建設新廠，職工常常露宿荒野，不少當地農民為三線廠的職工無償地提供住宿和被褥。八五鋼廠所在的梅街村幾乎每家每戶都曾經住過上海來的職工^⑦。職工在村民那裏住了半年到兩三年，直到工廠宿舍建好，才漸次搬離。此外，當地也在建材、食品等方面為三線建設提供幫助。皖南地方政府累計為上海小三線提供了磚2,617萬塊、瓦581萬塊，以及沙、石木料、毛竹等物資。三線廠日常所需的蔬菜和副食品大部分是當地提供的^⑧。

除了上述土地、勞動力、建材、食品等物質層面上的支援外，更重要的是當地農民對三線廠的配合與「不搗亂」，為三線廠的生產建設提供了一個相對良好的秩序和安定的環境。這點至關重要，卻常常被忽視。如前所述，儘管三線廠代表的工業文明相對於農村和農民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但畢竟三線廠是從城市「客居」到農村，這意味着當地農民可以有許多方式和手段來干擾三線廠的日常生產。通過行使「傷害權」，農民可以從三線廠那裏獲得實質性的經濟利益，譬如通過破壞道路、電纜、水管等基礎設施，私自佔用工廠物資，聚眾圍堵工廠大門等方式，使工廠妥協並答應農民提出的要求，形成類似「敲竹槓」的行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尤其是上層反覆要求改善工農關係的背景下，農民採取這類行動通常不會遭到嚴厲的懲罰。地方政府和三線廠在面對農民的集體行動時多傾向於採取息事寧人的做法，例如1980年後方基地輕工公司要求各廠「在雙方發生矛盾的時候，要嚴格檢查要求自己，盡力使事態不擴大」^⑨。在1980年代人民公社制度解體之後，農民個體利益取代了原來的公社集體利益，使得農民有更強烈的動機通過行使「傷害權」而獲利，因此，三線廠若想平穩有序地進行正常的生產，離不開農民對自我行為的約束，以減少對三線廠的干擾。正如下文的例子提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當地農民不斷增多的機會主義行為，嚴重妨礙和影響三線廠的正常生產，部分企業甚至因為與農民的關係緊張而停產。而這也反過來說明，當地農民「不搗亂」的合作態度對三線廠在1960、70年代的建設與運營曾發揮過積極作用。

(二) 農民與三線廠爭利

農民的利己行為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增多，與三線廠的矛盾和衝突也不斷發生。在1960、70年代，三線廠為了與當地建立關係，在物資、技術、人力、資金等多方面給予農村大量的援助，並且大多是無償贈予。因此，農民起初對三線廠的到來表示極大的歡迎。然而，隨着時間推移，援助的實際效果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的現象，農民逐漸將三線廠的援助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對三線廠的援助產生依賴。東至縣的一位幹部在訪談中表示，當時很多生產大隊到後來一遇到困難，就直接找三線廠幫忙。這種現象十分頻繁，以至於當地幹部不得不經常出面對農民進行勸阻^⑩。然而，在習慣了這種援助之

後，當三線廠減少援助或無法滿足農民的要求時，農民便會感到不滿甚至憤怒，進而採取挖溝斷路、封堵工廠等做法，阻礙工廠正常運轉^⑨。

農民的利己行為明顯增多，一方面是由於國內外政治形勢的緩和，三線廠的備戰使命不復存在，軍工訂單大幅減少，三線建設的戰略地位迅速跌落，三線廠的政治光環逐漸黯淡；另一方面是因為在人民公社瓦解後，農民謀求個人經濟利益的動機明顯增強。農民利用自己的「主場」優勢，盡可能地從三線廠那裏謀取個人利益。農民對三線廠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並將三線廠視為可以佔便宜的對象。其中，偷竊案數量在1980年代開始迅速增加。1985年，上海市副市長朱宗葆赴小三線考察時，八五鋼廠向其匯報了當時廠區附近農民肆意哄搶和盜竊工廠物資的情況，並稱「社會上有些人利用各種手法肆無忌憚地偷盜廠內各種緊俏物質，僅鋼材被竊一項，二月內報案就有10多起」^⑩。1985年8月，協作機械廠總裝車間2,594個「新四〇」火箭彈點火具部件和2,600個點火藥盒被盜，價值11,026元，案犯被捕時稱：「你們要跑了〔指三線廠準備撤回上海〕，今後想搞也搞不到了。」^⑪

盜竊行為愈演愈烈，甚至發展成為公開的哄搶。農民在工廠運輸線上，利用卡車上坡減速的時機，或故意讓耕牛擋道迫使卡車減速，然後用鋤頭、鐵搭在卡車後欄板處扒煤炭、廢鋼等物資。在皖南貴梅公路沿途上坡處，常有小孩、老人趁汽車上坡慢速時，用竹竿、木棍、竹扒等工具，將八五鋼廠運輸車上的煤塊扒下地袋裝回家。儘管該廠多次向當地公社反映問題，但扒煤塊的情況仍不見收斂。該廠保衛科對哄扒人員進行了批評教育，但當地農民不予理睬^⑫。八五鋼廠對此無可奈何，只能不斷請求農村社隊對扒煤銷贓的農民進行處理，勸阻哄扒行為，但是收效甚微。此外，當地農民為了獲取工廠物資而鋌而走險，還可能造成人員傷亡，引起雙方之間的紛爭。協作機械廠有個靶場用於軍工產品試驗，每當該廠進行試驗時，周邊的農民都會冒險跑到靶場內蹲點守候，準備揀拾沒有引爆的紫銅「液型罩」，拿回去打手爐或腳爐。後來有一次，一隻液型罩意外飛出，擊中蹲在山上守候的一名當地婦女，導致該婦女當場死亡，結果引發了當地村民和工廠之間很嚴重的糾紛^⑬。

農民對水、木材、土地等自然資源的爭奪也日益增加。梅街村農民與八五鋼廠爭奪水源是一個典型案例。八五鋼廠建有兩處水源，一處是潘橋的深井水，一處是白洋河水，除了維持全廠生產、生活用水外，還長期為當地社隊和單位供水。1980年代中期，農民在白洋河上游層層攔壩阻水，與八五鋼廠爭奪水源；廠區四周的不少農民擅自接自來水進戶，並要求廠方擴大放水量，以滿足農田灌溉。由於農民並不承擔供水的成本，故而在水資源的使用上缺少內在約束，不注重節約。當八五鋼廠調節用水分配時，當地農民甚至曾衝進水泵房，揚言要砸爛水泵閥門。於是，每到盛夏季節，用水十分緊張，廠方和農民經常因為水源問題發生摩擦^⑭。

農民利己行為的增加反映出1980年代中期農村與三線廠雙方關係發生了重要轉變。農民從集體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謀求個體利益的動機迅速強化；而此時三線廠的備戰使命不復存在，面臨破產和被逐步裁撤的命運。在雙方的互動關係中，農民和農村逐漸變得強勢，而三線廠的地位則有所下降。相對於建廠初期而言，此時雙方的地位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四 結語

從上文對上海小三線建設過程的考察可見，在這場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間的互動中，雙方的關係是多向性且隨時間變化的，而並非三線廠向農村單向地輸出工業文明。三線廠給所在的農村帶來物質援助和工業文明的同時，當地農民也給予三線廠主動的回饋。由於工業文明相對農業文明的天然優勢，三線廠長時間主導着雙方關係的進程和走向。但與此同時，農村的「主場」優勢也不可忽略，農民的支持與配合對於三線廠而言不可或缺。

與二十世紀末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不同，三線建設的初衷在於備戰，其直接的目的是在內地建立一個獨立的軍工體系，而非發展內地工業。因此，三線廠給當地農村和農民提供的物資、技術、人力、資金以及其他方面直接或間接的援助，實際上是為了換取農民對三線建設的配合、支持與「不搗亂」，相當於一種捐贈行為，只不過這種捐贈行為是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反覆聲明改善工農關係的行政指令下進行的。這就決定了在雙方互動過程中，三線廠扮演着一個積極的援助者角色。與此同時，三線廠在各方面給予農村的捐贈，都只停留在幫助當地解決農業生產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困難，並沒有任何迹象表明三線廠有意改變當地的經濟結構。

在當時嚴格的城鄉二元體系中，三線廠儘管位處山區，但仍歸屬城市體系，三線廠職工在內地工作多年但並未在當地扎根，城鄉之間的體制性分隔是重要因素之一。就上海小三線而言，儘管坐落於皖南，但仍是上海的一塊飛地，其生產原料來自外地，產品也調撥外地使用，職工仍屬上海戶口，相應的管理部門也是上海市政府屬下的機構。這種分隔的生產狀態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礙三線廠與當地農村之間的深入交往。雙方儘管有很多聯繫，但仍保持明顯的距離，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當時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城鄉關係。同時，這也決定了三線廠與農村之間並不存在根本利益上的衝突，因此，即使雙方時有發生摩擦，但都不是不可調節的根本性矛盾。

在影響雙方關係的諸多因素中，還有一點不容忽視，即雙方對自我行為的約束和調整。不論是三線廠還是農村，至少在三線建設的早期，都曾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較為有效的約束，以求與對方改善關係。在三線廠一方，官方曾要求職工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尊重當地社隊，不得歧視農民。馬天水在1974年的小三線工作會議上反覆強調各單位「對縣、公社、生產隊要尊重，要聽取他們的意見，同當地關係一定要搞好」^⑤。後方基地管理局要求各廠「要教育職工尊重農民，遵守地方政府頒布的各项政策法令，尊重地方的風俗習慣，對於歧視農民的言行要堅決制止」^⑥。而皖南當地政府也對農民的行為進行一定的約束，要求農民不准使用帶有貶損色彩的詞彙如「上海佬」等稱呼三線廠工人，三線廠工人也不使用「老鄉」等稱呼當地農民，雙方以「師傅」互相稱呼。對於農民侵害三線廠利益的不當行為，當地政府和社隊幹部也會出面制止^⑦。對自我行為約束，並向對方展示友好，對於減少矛盾衝突的發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這也構成了雙方互動關係中的一部分。

三線廠與農村之間的關係和地位在改革開放前後經歷了較大的變化。在1960、70年代，三線廠與農村之間的交往是基於工廠與人民公社或生產大隊

之間的互動，本質上是兩個單位之間的互動，因而在上級政府部門的指示下，容易建立一致行動，遇到問題也容易協商解決。然而進入1980年代後，隨着人民公社的逐漸解體，三線廠與農村的交往就轉變為工廠與農民個體之間的互動，因而協調雙方關係的難度有所增加。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追求個人利益的動機被集體利益所抑制，而此時農民追求個人利益的動機明顯增強，要求三線廠給予更多補償。加上1980年代以後國內外政治形勢的緩和，三線建設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必要，政治光環褪去，從而導致雙方的地位出現了新的變化。

註釋

- ① 三線地區具體指京廣鐵路以西、甘肅烏鞘嶺以東、山西雁門關以南、廣東韶關以北的中國內地地區，包括四川、貴州、雲南、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等七省（自治區）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區，以及河南、湖北、湖南、山西等四省的西部地區。
- ② 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關於一、二線各省後方建設的重點〉（1965年3月14日），《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頁38。
- ③ 相關論著參見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李彩華：《三線建設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4）；吳曉林：《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戰略：三線建設的政治經濟學》（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2）；Barry J.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s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351-86；丸川知雄：〈中國的「三線建設」(I) (II)〉，《アジア經濟》，1993年第2期，頁61-80、1993年第3期，頁76-88。近年出現一批專門性論文，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舉，綜合性的研究成果評述以及各地小三線建設檔案的分布情況，參見段娟：〈近20年來三線建設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6期，頁100-109、128。
- ④ 徐有威、陳東林主編：《小三線建設研究論叢》，第一、二輯（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2016）；徐有威、吳靜：〈危機與應對：上海小三線青年職工的婚姻生活——以八五鋼廠為中心的考察〉，《軍事歷史研究》（北京），2014年第4期，頁34-43；張秀莉：〈皖南上海小三線職工的民生問題研究〉，《安徽史學》，2014年第6期，頁145-53；崔一楠、趙洋：〈嵌入與互助：三線建設中工農關係的微觀審視〉，《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頁134-40；陳熙、徐有威：〈落地不生根：上海皖南小三線人口遷移研究〉，《史學月刊》，2016年第2期，頁106-18；李雲、楊帥、徐有威：〈上海小三線與皖南地方關係研究〉，《安徽史學》，2016年第4期，頁158-65。
- ⑤ 〈關於當前上海後方建設的情況及存在主要問題和我們的意見〉（1967年3月），上海市檔案館，B246-1-106-9。
- ⑥ 〈關於上海小三線建設情況的匯報〉（1977年11月18日），上海市檔案館，B246-1-936-31。
- ⑦⑩ 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三線建設》（內部資料，1991），頁23。
- ⑧ 〈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草稿）〉（1965年9月2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59-44。
- ⑨⑬⑭ 〈關於後方小三線建設搬遷工作中若干問題請示報告〉（1966年7月22日），上海市檔案館，B67-2-26。
- ⑩④⑤ 〈上海市委和工交組領導對後方小三線工作的意見〉（1974年），上海市檔案館，B67-2-79。
- ⑪⑫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上海市後方基地管理局黨史編寫組：《上海小三線黨史》（未刊稿，原件藏於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1988），頁47；49-50；49-50；49；47-48；50；50；50。

- ⑫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關於小三線交通建設工作的幾點意見的通知〉（1965年7月30日），上海市檔案館，B257-1-4330-30。
- ⑬ 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後方建設搬遷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批覆〉（1966年7月22日），上海市檔案館，A38-1-351-82。
- ⑰ 〈關於上海後方基地建設的情況報告〉（1977年10月27日），上海市檔案館，B246-1-936-1。
- ⑱ 伍先權（安徽東至縣香隅鎮村民，原自強化工廠徵地工）訪談記錄，東至縣華爾泰公司家屬宿舍，2012年5月28日。
- ⑲ 〈申購支農用電動機事〉（1975年7月22日），協同機械廠檔案，上海重型機器廠有限公司檔案室，75-6，頁267。
- ⑳ 〈借房條〉（1984年10月28日），安徽省寧國市檔案館，85-15.W-1-1，頁44。
- ㉑ 〈協同機械廠1972年支農修理項目〉，協同機械廠檔案，上海重型機器廠有限公司檔案室，72-18，頁46-50。
- ㉒⑳㉓ 許來祥（安徽貴池梅街鎮梅街村村民，曾為八五鋼廠臨時水電工）、許春華（安徽貴池梅街鎮梅街村村民，原八五鋼廠徵地工）訪談記錄，貴池梅街鎮梅街村許來祥家，2012年5月23日。
- ㉔⑳㉕ 王金中（安徽東至縣香隅鎮村民，原紅星化工廠徵地工）訪談記錄，東至縣王金中家，2012年7月23日。
- ㉖ 〈關於要求接管原七〇三東至分所管轄的全部輸變電設施設備的請示報告〉（1985年8月29日），安徽省東至縣檔案館，21-1-1-140，頁39-41。
- ㉗ 洪明來（安徽東至縣香隅鎮龍崗村原村支書）訪談記錄，東至縣香隅鎮龍崗村，2012年5月21日。龍崗村為衛星化工廠所在地。
- ㉘⑳㉙㉚ 陳克智（安徽貴池梅街鎮梅街村原村長）訪談記錄，貴池梅街鎮梅街村陳山超市，2012年5月23日。
- ㉛ 龐吉忠（安徽東至縣建新公社林畝大隊村民，原衛星化工廠徵地工）訪談記錄，東至縣龐吉忠家，2012年5月27日。
- ㉜⑳ 畢文中（安徽東至縣香隅鎮新叉村原村支書，新叉村為自強化工廠所在地）訪談記錄，東至縣畢文中家，2012年5月28日。
- ㉝ 王世益（安徽東至縣小三線廠長江機修廠所在地小學教師）訪談記錄，東至縣堯渡鎮大碑村，2012年4月2日。
- ㉞⑳ 張渭德（中共安徽貴池市原市委書記，貴池小三線廠交接主要負責人之一）、徐新東（小三線廠交接期間張渭德的秘書）訪談記錄，貴池區經濟委員會辦公室，2012年8月21日。
- ㉟⑳ 張要華、楊愛玉（安徽東至縣香隅鎮龍江水廠所在地村民）訪談記錄，東至縣龍江水廠龍江飯店，2012年7月31日。
- ㊱⑳ 在浙江唯一的上海小三線工廠中——原上海協作機械廠辦公室負責人徐夢梅訪談錄，載徐有威主編：《口述上海——小三線建設》（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頁359；358。
- ㊲⑳ 汪福琪（安徽績溪縣小三線接交辦公室原副主任）訪談記錄，績溪縣汪福琪家，2012年3月15日。
- ㊳ 洪全旺（安徽東至縣香隅鎮龍崗村原村支書）訪談記錄，東至縣香隅鎮龍崗村洪全旺家，2012年5月21日。
- ㊴⑳㊵ 輕工公司研究提出當前改善工農關係的五條措施（1980年9月24日），上海市檔案館，B67-2-521。
- ㊶⑳ 陳桂梅（安徽東至縣紅旗大隊村民，原龍江水廠徵地工）訪談記錄，東至縣陳桂梅家，2012年5月27日。
- ㊷⑳ 章炎盛（中共安徽東至縣縣委原副書記、香隅鎮黨委書記，東至縣三線接交辦主要負責人之一）訪談記錄，東至縣委宿舍，2012年4月。
- ㊸⑳ 艱苦創業的小三線人——原上海市後方基地管理局黨委副書記鄭金茂訪談錄，載《口述上海》，頁78；75-76。
- ㊹ 〈上海市勞動局關於「八一二」指揮部需要安排徵地農民的情況調查〉（1970年11月10日），上海市檔案館，B127-3-119-30。
- ㊺ 〈上海市財政局革命委員會駐皖財政組關於貴池鋼廠實現轉虧為盈的調查報告〉（1974年7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B112-5-816-16。

- ⑤⑦ 〈「幫助很大，害處也有」——關於滿江紅廠支農情況反映〉（1972年9月30日），上海市檔案館，B67-2-2。
- ⑤⑧ 歙縣人民政府小三線接收調整辦公室：〈關於上海小三線在我縣單位基本情況的調查報告〉（1987年），安徽省歙縣檔案館，J014-1-660，頁4；3。
- ⑥⑧ 〈上海後方基地貴池地區五七農場規劃（討論稿）〉，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74-17卷22號，頁92。
- ⑥⑨ 〈為小三線做好後勤保障工作——原上海市後方基地管理局後勤處處長王中平訪談錄〉，載《口述上海》，頁106；107。
- ⑥⑩ 徐有威、楊帥：〈為了祖國的青山綠水：小三線企業的環境危機與應對〉，《貴州社會科學》，2016年第10期，頁36-45。
- ⑥⑪ 上海市後方儀表電訊公司：〈關於三廢治理項目批覆及頒發計量管理制度的通知〉（1979年4月5日），上海市檔案館，B70-2-174。
- ⑥⑫ 〈上海市後方輕工公司所屬廠基地關於三廢治理項目的報告、意見、通知和工作小結〉（1975年5月），上海市檔案館，B68-2-81。
- ⑥⑬ 〈擴散滲析法回收硫酸工藝試生產總結〉，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84-1卷1號，頁48。
- ⑥⑭ 〈八五鋼廠環境保護工作規劃（1980-1982）〉（1980年5月16日），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80-16卷94號，頁1-15。
- ⑥⑮ 〈環境保護工作的基本情況匯報〉（1976年7月15日），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76-16卷29號，頁22-25。
- ⑥⑯ 卞敬順：〈八五鋼廠自製小設備解決水質污染大問題〉，《解放日報》，1980年6月25日，第2版。
- ⑥⑰ 〈污言穢語招人譴，擒住黑龍待何時〉，《八五通訊》，第45期（1980年10月10日），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80-3卷27號，頁6。
- ⑥⑱ 〈關於申請徵用土地的報告〉（1975年1月22日），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75-18卷22號，頁90。
- ⑥⑲ 〈賠償樹木的報告〉（1976年2月4日），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76-18卷31號，頁2。
- ⑥⑳ 〈關於我廠建一個石油液化氣站的專題報告〉（1979年1月25日），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79-18卷84號，頁40-41。
- ⑦⑰ 崔一楠、李群山：〈1965年四川廣元對三線建設的支援〉，《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頁104-10。
- ⑦⑱ 〈國家建設徵用土地辦法〉（1958年1月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11。
- ⑦⑲ 〈佔用土地評定說量、協定價格統計表〉（1967年5月18日），安徽省寧國市檔案館，85-15.W-1-1，頁1。
- ⑦㉑ 〈原古田醫院（含二六〇）徵地申請書、審批表及圖紙〉（1969年11月18日），安徽省寧國市檔案館，85-15.W-1-2，頁4-7。
- ⑦㉒ 〈華東電業管理局上海後方三六六廠徵用土地補償協議書〉（1978年10月9日），安徽省寧國市檔案館，85-15.W-1-1，頁26-27。
- ⑦㉓ 〈艱苦創業的小三線人〉、〈小三線調整和交接圓滿卻艱辛——原上海市後方基地管理局黨委辦公室副主任朱岳林訪談錄〉，載《口述上海》，頁78、146。
- ⑦㉔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1985年1月31日），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85-1卷1號，頁3。
- ⑦㉕ 〈採取切實措施加強治安保衛工作〉（1985年9月5日），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85-16卷64號，頁65-66。
- ⑦㉖ 〈當地農民哄扒我廠汽車上煤塊的情況反映〉（1986年7月4日），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86-1卷1號，頁43。
- ⑦㉗ 〈地方與我廠爭水矛盾進一步突出〉（1984年8月15日），八五鋼廠檔案，寶鋼集團上海五鋼有限公司檔案室，84-1卷1號，頁134-35。